

# 譯者與譯史研究：理論與實踐

## 一、研究背景

翻譯理論自1990年代以來，即承襲1970年代興起於荷蘭、比利時等低地 (Low Lands) 國家的「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視文學系統為動態體系，並有將經典從中心地位轉為邊緣，甚至逐漸消失的趨向。翻譯研究學者吸取此一觀點，嘗試將靜態、微觀、規約的形式化文本，轉為動態、宏觀、開放及多面向的詮釋觀點，並逐步建立起朝向譯作與受眾詮釋觀點與方法論的「文化學派」翻譯研究。如 Susan Bassnett 與 André Lefevere 於1990年合著的 *Translation: History & Culture* 即其中代表著作。<sup>1</sup> 而以該書為論述的文化學派進而提出「翻譯的文化轉向」，倡言將譯論的重心由作者轉向讀者，並從「源語文化」轉為「譯語文化」。此舉為翻譯研究開創耳目一新的視野與方向，且獲得學界廣泛的迴響。

Lefevere 進一步提出影響譯者翻譯策略的主因為贊助人 (patronage)、詩學 (poetics)、意識形態 (ideology) 等觀點。<sup>2</sup> 在此一論述基礎上，Jean

---

1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 Culture* (London: Pinter, 1990).

2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Culture/History: A Source Boo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Delisle與Judith Woodsworth於1995年出版的*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sup>3</sup>指出譯者與贊助人的關係以及譯者最主要的貢獻。筆者將之梳理為：(1)創造(語言、風格、民族文學、締造歷史)；(2)傳播(知識、宗教、文化價值、編纂詞典)；(3)操控(權力、譯者主體性)。可以說，譯者確有其具體貢獻和重要功能，但亦不免透過譯事活動進行操控與介入。該書對於各國譯者與譯事活動的描述，印證了1990年代以來由Bassnett與Lefevre提出的「翻譯的文化轉向」論述。

其後，Anthony Pym在*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提出了譯史研究方法與目標，<sup>4</sup>並從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出發，將譯者研究置於譯史研究的重心。在其四項譯史研究「普遍原則」(general principle)下，指出譯者研究應包含：探索生平經歷、描述多重身分、從事翻譯的多重目的，以及該環境下所產生的譯事活動及其特徵等。

繼「文化轉向」之後，近十年來翻譯學界漸次藉由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會學理論，將翻譯研究推向社會關係網路下的行動者(agent)、描述其社會實踐空間、以及譯者進行社會實踐的主體性及其共同特徵，乃至掌握行動者社會實踐工具的資本類型及其轉換等。亦即，從社會結構的面向，確定行動者的社會位置，並將個體的主體性與社會的客觀性加以相互參照，將譯者與翻譯行動納入社會文化建構中的共同參與者，進而透過結構化、系統性、理論性的論述，使之成為可闡釋且廣泛應用的一套檢驗模型。

採取歷史研究路向的譯者研究，通常由該國學者或史料文獻保存地的學術社群所產出，主要研究方法與思路有兩種途徑：一是從過往的時代與社會脈絡中探尋歷史中的譯者，研究者從史料、文本、譯史、翻譯

---

3 本書的出版由以譯者組成的協會主動出擊，並透過UNESCO同時發行。除英、法文版外，已陸續譯為多種語言。本書的問世，對於翻譯研究發展而言，無論內在的意涵或是外在的形式，都揭示了譯者的主體意識及其可觀的行動力。本書前半部以研究方法為主，後半部則以譯者描述與分析為要。Jean Delisle and Judith Woodsworth,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4 Anthony Pym,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8).

理論等探索並描述譯者的譯事活動與知識生產，並綜合歸納譯者角色與屬性特徵等；另一途徑則是採取文化社會學角度，針對譯者群體屬性及其社會活動的接點，進行口述訪談及其話語分析等，藉此探究該群體的譯者角色與屬性特徵，並補足書寫材料無法對應的空缺。從後者的研究中，我們已可略見翻譯的「社會學轉向」(sociological turn)。

翻譯的社會學研究途徑，早在 Theo Hermans 的著述 *Translation in Systems* 即已指出，<sup>5</sup> 翻譯深嵌於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系統之中，是其內部的重要操作力量。然而，這樣的理論詮釋未如布氏理論以行動者 (actors) 為核心，且以推展社會化概念及結構性解釋為目標，將譯者與譯事活動同時置於社會的動態變化過程中，進行共時性的考察分析。

而將布氏理論用於譯者研究的學者，以社區口譯研究為先，其中又以為現居英國的 Claudia V. Angelelli 最具代表性。<sup>6</sup> 她多年來針對加拿大、墨西哥、美國的會議口譯員及法庭與醫療口譯者所做的角色分析，<sup>7</sup> 可說迄今成果最為突出，也是社區口譯領域受引述最多的學者。她的口譯員角色研究從人際、機構、社會等三方面切入，並就社會組織與社會結構的面向將布氏理論納入，以解釋譯者受到社會及文化語境作用的成因及其影響。

2005 年英國 Taylor & Francis 出版的重要學術期刊 *The Translator*，推出“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ng”特刊號，由 Moira Inghilleri 主編，該輯有兩篇重要著作特別值得關注。其一為主編 Inghilleri 撰述的“The Sociology of Bourdie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bject’ in Translation

5 Theo Hermans,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UK: Routledge, 2014).

6 Claudia V. Angelelli, *Medical Interpreting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7 Claudia V. Angelelli, *Revisiting the Interpreter's Role: A Study of Conference, Court, and Medical Interpreters in Canada, Mexico, and United State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4).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sup>8</sup>她援引布迪厄的理論觀點，指出翻譯研究的視角轉為將翻譯活動置於歷史與社會文化的脈絡中思考；而以口筆譯者為焦點，將其角色功能視為社會與文化活動中的行動者，考察譯者在口筆譯活動的複雜網絡下所引發的特定影響，可更深入探索譯者及其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

另一論文則是加拿大學者 Jean-Marc Gouanvic 的“A Bourdieusian Theory of Translation, or the Coincidence of Practical Instances”，<sup>9</sup>其副標題即以布迪厄觀察社會結構與行動者的重要研究為思考基礎，以“Field, ‘Habitus’, Capital and ‘Illusio’”為其主軸。該文以 19 至 20 世紀美國文學在法國的翻譯及譯者活動為主要觀察場域，藉由布氏前述概念，提出對於譯者群體慣習的歸納與描述。

*The Translator* 於 2005 年推出的 Bourdieu 特刊，顯然迅速發生了影響。2006 年 12 月，鳥飼玖美子發表博士論文，<sup>10</sup> 後於 2009 年出版 *Voices of the Invisible Presence: Diplomatic Interpreters in Post-World War II Japan*，其中有三章分別以“Habitus”、“Field”、“Practice”作為標題。<sup>11</sup> 顯然，運用布迪厄理論的用意十分明確。而其第二章〈口筆譯研究源流〉針對翻譯的等值、規範、倫理、自主性、後殖民、社會學研究方向等課題，則揭示了日本翻譯學者對於布迪厄社會學與翻譯學研究的關注。

受 Angelelli 影響深刻並提出重要著述的任文教授，<sup>12</sup> 在 2013 年的後續論文亦直接以布氏的「場域、慣習和資本」為題，<sup>13</sup> 探討社區口譯中的

8 Moira Inghilleri, “The Sociology of Bourdie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bject’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The Translator* 11 (2005), Issue 2, pp. 125–145.

9 Jean-Marc Gouanvic, “A Bourdieusian Theory of Translation, or the Coincidence of Practical Instances,” *The Translator* 11 (2005), Issue 2, pp. 147–166.

10 Kumiko Torikai, *Voices of the Invisible Presence: Diplomatic Interpreters in Post-World War II Japa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9).

11 “Practice”可譯為「實踐活動」，是來自布迪厄「實踐理論」(theory of practice)的概念。

12 任文：《連絡口譯過程中譯員的主體性意識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

13 任文、徐寒：〈社區口譯中場域、慣習和資本——口譯研究的社會學視角〉，《中國翻譯》2013年第5期，頁16–22。

社會學研究方法及其實踐等。該文除介紹布氏理論源流外，也針對該理論在口譯場域的應用優勢及不足之處提出清晰的描述。

藉由歷史學的方法及資料運用，可以對於過去特定時期與社會體制中譯者與譯事活動的探究與檢證，並與理論進行歷時性的對話。經由理論的檢驗分析，將過往的譯者群體描述與角色功能分析，結合歷時與共時性的考察視角，進行社會結構下的脈絡化與理論性的論述建構，以充實譯者研究的理論層次及其方法學等知識內涵。

## 二、研究動向

承續前述理論脈絡，2000年以來中國內地、香港、臺灣與新加坡等華語圈學者以及日本翻譯學界，在以譯者為核心的譯史研究領域上，陸續提出不少突破創新的成果。尤其在幾位領袖級學者的帶動下，投入的年輕學者有日益增加之勢。由於本領域起步不久，故在研究成果之外，下文對於其中最具指標意義的研究學者及其學術活動，儘可能加以涵蓋並披露其成果概要。

日本學界的譯者與譯史研究，首推立教大學跨文化溝通研究所武田珂代子教授。她於2007年完成西班牙 Rovira i Virgili 大學博士論文，該研究以二戰後東京審判中的口譯員為考察對象，針對審判過程中的三段式口譯途徑（日本外交官譯員、日裔美籍雙語監測員、美國白人語言裁定官），<sup>14</sup> 以及三者之間的權力消長與譯事關係等進行分析。該研究意圖呈現政治權力下的審訊中，不同族裔、國籍、身分譯者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武田教授近年研究內涵日益深化，透過史料、文本、史觀、翻譯理論等探索譯者的譯事活動，其研究視野與方法可說是前述譯史與譯者研究的代表。<sup>15</sup>

14 武田珂代子：《東京裁判における通訳》（東京：みすず書房，2008）。

15 武田珂代子（譯），Anthony Pym（著）：《翻譯理論の探求》（東京：みすず書房，2010）。

而另一方面，採取文化社會學角度及口述歷史研究方法的代表學者，則為鳥飼玖美子教授。她2007年的博士論文，是其譯者研究的代表作。該文透過口述歷史與口譯案例分析，訪談戰後日美外交中的頂尖譯員——西山千、相馬雪香、村松增美、國弘正雄、小松達也，並依此描述譯者生平、譯者養成、職場經歷等。<sup>16</sup>同時，透過譯者自述歸納其口譯角色及對自身任務的自覺，該書可說是前述譯者口述訪談研究的代表著作。

她於2004至2012年擔任「日本通譯翻譯學會」會長，在此期間除積極邀請歐洲翻譯理論學者Jeremy Munday與Franz Pöchhacker訪日外，<sup>17</sup>還擔任監譯將其相關著作譯介為日文。<sup>18</sup>此外，她在電視、報紙、出版等媒體上曝光率甚高，同時擔任國立國語研究所評議委員等要職，故在日本英語口語傳播、口筆譯教學、乃至翻譯學術上皆具意見領袖的地位。

而在中國大陸首開先聲的是2014年退休（2020年離世）的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謝天振教授。他於2009年開辦了《東方翻譯》季刊並擔任副主編；該刊在譯論引介、譯學動向、新刊書評等學術領域持續推展，也是中國最積極披露譯史與譯者研究的翻譯學術期刊。

2007年，謝教授倡言「譯介學視野下的譯者研究」，<sup>19</sup>聚焦於：(1) 譯者的翻譯活動與創作文學之間的關係；(2) 譯者對於翻譯文學的貢獻。該研究視角承襲了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的譯者研究觀點，並在後來他主編的《中西翻譯簡史》中，<sup>20</sup>繼以譯者在傳播與創造上的貢獻為主軸，對於中西翻譯發展的歷史進行兼容並蓄的描述。在譯者研究對

16 鳥飼玖美子：《通訳者と戦後日米外交》（東京：みすず書房，2007）。

17 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Franz Pöchhacker,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8 鳥飼玖美子（監譯），Jeremy Munday（著）：《翻譯學入門》（東京：みすず書房，2009）。

鳥飼玖美子（監譯），Franz Pöchhacker（著）：《通訳学入門》（東京：みすず書房，2008）。

19 謝天振：《譯介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20 謝天振：《中西翻譯簡史》（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謝天振：《中西翻譯簡史》（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3）。

象上，他提出的譯者有兩類：一是集文學家與翻譯家於一身者，如魯迅、茅盾、郭沫若、徐志摩、卞之琳等，其譯者研究聚焦於翻譯活動與創作文學之間的關係；而另一類則是知名職業翻譯家，如林紓、嚴復、朱生豪、傅雷等，重點在於探究他們對於翻譯文學的貢獻。<sup>21</sup>

而香港學界的譯史研究，以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王宏志教授的投入最受矚目。他自2009年起每兩年舉辦一次「中國翻譯史研究暑期班」，除延聘頂尖講師培養中國內地、香港、臺灣優秀碩博士班學生投入譯史研究外，還於暑期班隔年主辦「書寫中國翻譯史：中國譯學新芽研討會」，鼓勵暑期班學員將研究成果在研討會中展現。2011年，他還創辦了以中國翻譯史為主要探究對象，並譯介國外翻譯史研究論文的《翻譯史研究》(年刊)。同年又推出該校翻譯研究中心成立40週年紀念論文集 *Towards a History of Translating* (《走向翻譯的歷史》)，共計三冊。

王教授本人則以鴉片戰爭中的譯者為研究範疇，<sup>22</sup>大量運用英國外交史料與文本進行研究，顯示史學研究方法與資料運用，對譯者及譯史研究產生十分顯著的影響。由於王教授的大力推動，顯然已經產生明確的傳承效果，例如2015年《翻譯史研究》刊載了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陳雅晴的〈亦趨亦離：早期港英殖民政府的華人譯者(1843-1900)〉。<sup>23</sup>至此，香港殖民時期的譯者群體研究，已由青年學者初試啼聲，令人欣喜。

王教授引述Van Hoof的看法：「翻譯史的書寫，能促進人們對整個人類文化歷史的重寫」，且積極回應了謝天振教授撰寫翻譯史的呼籲。<sup>24</sup>他的研究以晚清以降的中國翻譯史為主軸，探討範圍涵蓋明末清初的中

21 謝天振：《譯介學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229。

22 王宏志：〈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譯者〉，《翻譯史研究(2011)》(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82-113。王宏志：〈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譯者 下篇：英方的譯者〉，《翻譯史研究(2012)》(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1-58。王宏志：〈1816阿美士德使團的翻譯問題〉，《翻譯史研究(2015)》(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頁52-98。

23 陳雅晴：〈亦趨亦離：早期港英殖民政府的華人譯者(1843-1900)〉，《翻譯史研究(2015)》，頁263-313。

24 王宏志：〈一本《晚清翻譯史》的構思〉，《中國比較文學雜誌》2001年2期，頁100-109。

英通事、晚清的翻譯贊助人(如林則徐、恭親王及嚴復的贊助人吳汝綸)、京師同文館與晚清翻譯以及對周作人、魯迅、梁實秋、卞之琳等研究。<sup>25</sup>從以上譯者研究看來，王教授的研究對象與謝天振教授所提出的兩類譯者，正巧不謀而合。就文化學派的理論脈絡而言，其來有自，實非偶然。

而在新加坡方面，任教於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的關詩珮教授，近年對於譯史與譯者研究亦有可觀的成果。2012年她提出英國傳教士及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針對香港翻譯官學生培訓計劃(1860–1900)翻譯課程的相關研究。<sup>26</sup>該研究透過爬梳英國殖民地部的檔案，詳述理雅各開辦者的角色及其返回英國後的影響和作用等。<sup>27</sup>文中除細膩描述當時譯者不足所遭逢的社會困境外，也在因應過程中彰顯理雅各對於翻譯的貢獻。同時，本文亦有意藉此突顯亞洲殖民知識生產與英國本土漢學關係的互動發展。<sup>28</sup>

2012年，她還有一項針對1847至1870年英國外交部中國學生譯員計劃的研究，<sup>29</sup>探討譯者威妥瑪(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在該計劃中的角色功能，以及該計劃中的師資、教材、教學法、考核、評量等。從她新近的研究即可看出對於譯者角色與其譯事活動的描述，在分量上已有日趨顯著的傾向。

25 王宏志：《翻譯與文學之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6 關詩珮：〈大英帝國、漢學及翻譯：理雅各與香港譯官學生計劃(1860–1900)〉，《翻譯史研究(2012)》(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59–101。

27 Uganda Sze Pui Kwan, “Translation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Mission: The Career of Samuel Turner Fear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 King’s College,”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24 (2014), No. 4, pp. 1–20.

28 Uganda Sze Pui Kwan,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and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 into World Language,” in David Der-wei Wang (ed.),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Massachuset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19–125.

29 關詩珮：〈翻譯政治與漢學知識的生產：威妥瑪與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學生譯員計劃(1843–1870)〉，「從晚明到晚清：文學·翻譯·知識建構」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2年11月1–2日)。

2013年她從倫敦大學挖掘了一手史料，進行文本梳理後，分析英國漢學家斯當東(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來華的譯事活動及其返國後透過從政極力贊助翻譯與漢學活動。斯當東1847年在倫敦大學國王學院設立中文教席，大量培養翻譯中國情報的人才。2014年，她揭露了斯當東的繼任者佐麻須(James Summers, 1828–1891)與英國十九世紀在中國及東亞龐大政經利益的錯綜關係。她的研究突顯了譯者的知識生產與主體性，推展了英國本土漢學的發展乃至國家利益的維護。這在譯史議題與史料發掘上，是頗具新意與創見的成果。

至於臺灣，第一篇考察範圍最廣的譯者研究，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教授的〈日治時期臺灣的通譯〉。<sup>30</sup>她透過梳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等大量官方史料，將日治時期的通譯養成、類別、經歷等，作出一個鳥瞰式的描述。該文提供了豐富的史料來源，為其後的臺灣日治時期譯者研究，展開了具指標意義的論述。<sup>31</sup>

其次，在日治法院通譯研究方面，以日本津田塾大學國際關係學科准教授岡本真希子<sup>32</sup>為最早。她透過《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與《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等大量官方史料，針對臺灣法院通譯的整體屬性與個案進行描述。她以《語苑》前後四位主編及兩位臺籍法院通譯為對象，並附上人事檔案作為佐證。其觀察著眼於法院判官、檢察官、法院通譯等官僚體制的脈絡梳理，對於主編《語苑》的法院通譯則視之為「實務型下層官僚」，並針對個別通譯提出檔案整理與描述。2012與2013年，岡本進而針對1910至1940年《語苑》的主編與編輯委員、評議員等數十位通譯

30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的通譯〉，《輔仁歷史學報》第18期，頁1–44。

31 許雪姬：〈他鄉的經驗：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口述〉，當代上海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來自海峽兩岸的探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177–212。

32 岡本真希子：〈日本統治時代台湾の法院における『通訳』たち——『台湾總督府公文類纂人事關係書類から見る台湾人/ 地人『通訳』〉，《第五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頁153–174。岡本真希子：《植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台湾總督府と帝国日本》(東京：三元社，2008)。

的生平簡歷及著作等詳加列舉，提出大量法院通譯的人事資料，其史料文獻的處理方式和考察成果均值得借鑑。<sup>33</sup>

此外，淡江大學日文系副教授富田哲則從日治時期的社會語言研究視角，運用日臺公文書及相關史料，探究總督府翻譯官與基層通譯的臺灣土語學習及其知識內涵。近年富田漸有朝向總督府翻譯官與政治體制關係的研究傾向。<sup>34</sup> 他的研究對於日治時期翻譯史的探究頗具佐證之功。

富田哲的專著《植民地統治下での通訳・翻訳——世紀轉換期臺灣と東アジア》收錄了七篇以殖民統治下的翻譯與通譯為焦點的研究，<sup>35</sup> 透過語言政策與語文教育及實務運作等面向，考察日治時期政府各級單位中的各類譯者群體，包括總督府高階翻譯官，以及民政局轄下的臺語、客語、原住民語等基層警察通譯的養成及其生產活動。該研究主要根據《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府報、官報、職員錄，以及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的公文書檔案等，詳查出總督府翻譯官的員額、職稱、薪給、位階、隸屬單位、語言專長等。同時，也旁及日治時期翻譯官與南進政策的關係，以及「清國通」翻譯官的定位等課題的探究。

2011年，王宏志教授主持的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研究計劃「翻譯與亞洲殖民管治(2011-2014)」，由筆者負責其子計劃「翻譯與臺灣殖民管治」。2012年9月27日於中研院臺史所舉辦「日治時期的譯者與譯事活動」工作坊，並提出五篇學術論文。<sup>36</sup> 2013年9月14日與臺灣

33 岡本真希子：〈日本統治前半期台湾の官僚組織における通訳育成と雑誌『語苑』——1910-1920年代を中心に〉，《社会科学》第42卷第2、3號(合併)(2012年12月)，頁103-144。岡本真希子：〈「国語」普及政策下台湾の官僚組織における通訳育成と雑誌『語苑』——1930-1940年代を中心に〉，《社会科学》第42卷第4號，頁73-111。

34 富田哲：〈日本統治初期の台湾總督府翻譯官——その創設及び彼らの経歴と言語能力〉，《淡江日本論叢》第21輯(2010年6月)，頁151-174。富田哲：〈日本統治期をとりまく情勢の変化と台湾總督府翻譯官〉，《日本台湾学会報》第14號(2012年6月)，頁145-168。

35 富田哲：《植民地統治下での通訳・翻訳——世紀轉換期臺灣と東アジア》(臺北：致良出版社，2013)。

36 工作坊論文並未正式出版。但部分論文經大幅修訂後，收入筆者2015年主編之專書。詳下註。

翻譯學學會、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大文學院翻譯碩士學位課程等合作，於國家教育研究院舉辦「譯史中的譯者」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年6月於《翻譯學研究集刊》第17輯推出「譯史與譯者研究」特刊。

2012年初至2015年間，筆者策劃推動每月一次、連續40次的「譯者研究讀書會」。與此讀書會相關的幾場學術活動包括：前述工作坊及2013年6月在國教院舉辦的「譯者與譯史研究工作坊」，特邀許雪姬及張隆志兩位史學教授講授史學研究方法與史料運用。2015年12月，由筆者主編並邀集七位讀書會成員完成了由臺大出版中心刊行的《日本統治期臺灣における訳者及び「翻訳」活動：殖民地統治と言語文化の錯綜関係》（《臺灣日治時期的譯者與譯事活動——殖民統治與語言文化的錯綜交匯現象》）。<sup>37</sup>

2013至2015年筆者在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碩博士班首開「臺灣日治時期翻譯專題研究」，培養了幾位碩士生完成論文，<sup>38</sup>另外陳韶琪於2021年提出研究日治初期複通譯兼漢詩人趙鍾麒的博士論文。此後，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的賴慈芸教授，也於2017年在該所開設了「臺灣翻譯史」課程。而她指導的張綺容（思婷），則先於2015年完成博士論文《臺灣戒嚴時期的翻譯文學與政治：以〈拾穗〉為研究對象》。<sup>39</sup>

此外，臺北市立大學英語教學系陳宏淑副教授，自2010年以來針對晚清譯者包天笑等人的譯作所展開的轉譯史研究，可謂饒富巧思的研究課題。其中包含譯者的操控、轉譯語言與文本的深入追蹤等，<sup>40</sup>相當

37 楊承淑（主編）：《日本統治期台湾における訳者及び「翻訳」活動：植民地統治と言語文化の錯綜関係》（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38 陳宛頻：《通譯的國族認同之探討：以皇民化時代戰場通譯為例》（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碩士論文，2013）。涂紋鳳：《日治時期原住民蕃語集中的「警察」形象解析——以1905-1933年日蕃對譯教本為範疇》（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碩士論文，2015）。

39 張思婷：《臺灣戒嚴時期的翻譯文學與政治：以〈拾穗〉為研究對象》（臺師大翻譯研究所博士論文，2015）。

40 陳宏淑：〈《馨兒就學記》前一章：《兒童修身之感情的轉譯史》〉，《翻譯學研究集刊》第17輯（2014年6月），頁1-21。

程度反映了「翻譯的文化轉向」以來的研究視角與方法，<sup>41</sup>且又能從多語譯本與譯史脈絡中切入，<sup>42</sup>近期研究成果豐碩，深受學界肯定。

賴教授近年投入臺灣戰後翻譯偽本問題的研究，<sup>43</sup>帶出了戰後譯者身分及其背後生態的探究，<sup>44</sup>為國府來臺後至解嚴間(1945–1987)約達40年的譯事活動作出深入的挖掘與梳理。同時，也對臺灣在受殖民與戒嚴時期之間的轉折提出了明確的交代。2019年，她主編的《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由12位學者共同完成了一部623頁、貫穿百年的臺灣翻譯史研究，頗具里程碑意義。<sup>45</sup>

受前人研究論述影響，近年學界的譯史研究幾乎都以屬性相近的譯者群體為觀察對象，且兼顧其時代性與社會性等歷史背景成因的分析。而Delisle與Woodsworth所提出的譯者活動的三大特徵創造、傳播、操控的觀點，也在前述學者近年的研究成果中陸續得到有力的佐證。

從中國內地、香港、臺灣、新加坡與日本等研究成果可知，譯者研究的理論背景大都來自歐美學者的論述，但研究的對象則為其本土譯者或譯事活動。而前述學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也都集中於近十年，可見學界對於此一領域的投入，已在各地不約而同地展開。尤其，在各地領袖型學者的積極帶動之下，如今已有數項區域合作的學術研究陸續推展。例如，武田珂代子、政治大學歷史系藍適齊以及法國學者等，參與

41 Hung-Shu Chen, "Chinese Whispers: A Story Translated from Italian to English to Japanese and, finally, to Chines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East Asia* 東亞觀念史集刊 8 (2015), pp. 267–307.

42 陳宏淑：〈翻譯「教師」：日系教育小說中受到雙重文化影響的教師典範〉，《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6期(2015年3月)，頁31–62。Hung-Shu Chen, "A Hybrid Translation from Two Source Texts: The In-Betweenness of a Homeless Orphan,"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編譯論叢 2 (2015), vol. 8, pp. 89–120.

43 賴慈芸：〈不在場的譯者：論冷戰期間英美文學翻譯的匿名出版及盜印問題〉，《英美文學評論》第25期(2014年12月)，頁29–65。

44 賴慈芸：〈幽靈譯者與流亡文人——戰後臺灣譯者生態初探〉，《翻譯學研究集刊》第17輯(2014)，頁23–55。賴慈芸：〈咆哮山莊在臺灣：翻譯、改寫與仿作〉，《編譯論叢》第6卷第2期(2013)，頁1–39。

45 賴慈芸(主編)：《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新北市：聯經，2019)。

和田英穗教授主持的「對BC級戰犯中臺籍戰犯的研究——以中英法澳戰犯審判為例」（日本學術振興會研究計劃，2011–2014）。<sup>46</sup> 其中，武田與藍教授的部分即與通譯研究相關。

以上亞洲相關研究成果，以及中國內地、香港、臺灣地區的學術活動，顯現各地自有其學術脈絡與發展特色；尤其老中青三代學者之間，可見學術研究的橫向社群集結與縱向傳承之勢。這些都顯示十年來譯者與譯史研究的播種扎根，可望得到開花結果的榮景，甚至，足以進一步在國際學術舞臺上發聲發揚。各地既擁有豐饒史料與題材，更不乏有志學者與學子，深盼繼續充實其理論及學術內涵，以不負天時、地利、人和的良好契機。

### 三、結語

現代史學既追求重建客觀歷史與事實真相，同時也對歷史的客觀性持續質疑。因此，如何將社會的多元面貌與網絡特質納入歷史研究的視域，並找尋相對於過往以「重要事件」與「重點人物」為主軸的歷史敘事與研究脈絡；從特定時空下找尋具關鍵意義的跨語和跨界人物，透過他們的譯事活動與人際網絡，和當時的政治環境、社會經濟、時代氛圍加以勾連牽動，讓小人物的集合與印記成為大歷史的佐證，甚或形成翻轉。而透過譯者場域與論述所設定的權力位置乃至關係網路，都是理解譯者進行社會行動的關鍵節點，也是闡釋結構與行動之間互動關係的切入重點。

譯史研究如何找出一個介於外來者與本地人之間的觀察角度，是翻譯學者可以著力之處。而以西方譯史與譯者研究論述闡釋過往的譯者角色，透過各時期的譯者身分形成與譯事活動等課題，可以發展為具本土

---

46 Kayoko Takeda, "Interpreting at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bunal," in Shlesinger, Miriam and Franz Pöschhacker (eds.), *Doing Justice to Court Interpret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0), pp. 9–27.

特色與觀點的翻譯學研究並深化其內涵。未來，因應譯者及其翻譯活動、乃至當地歷史的跨領域研究而形成的學術社群亦足以為各自的學科開創新格局與新視野。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